

〈隆中對〉缺失評議

潘柏年^{*}、林曉筠^{**}

（收稿日期：101 年 3 月 28 日；接受刊登日期：101 年 6 月 28 日）

提要

〈隆中對〉之得失，海峽兩岸均有論文探究，臺灣學者主要把蜀漢不能復興漢室的責任，歸諸於關羽大意失荊州，此說過於直觀單一，難免忽略其他因素；大陸一些學者已注意到〈隆中對〉本身的缺失，唯諸說各有焦點，未能全面性探究此一問題。故本文主旨，乃全面性檢討〈隆中對〉之缺失。

本文主張〈隆中對〉先天存在五大無解之難題，故雖有三分之功，卻無定鼎之業。知其得，則知其失；知其失，則益知其得。經由檢討〈隆中對〉之缺失，則更能體認諸葛亮卓越的眼光與智慧，能為當時尚無根據地的劉備，規劃一確實可行的建國藍圖，並導演半世紀餘的歷史走向。但由於外在環境限制，興復漢室本就是在不可能中尋求一絲機會，斷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

關鍵詞：隆中對、諸葛亮、三國、蜀漢

* 亞東技術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生。

一、前言

三國時代最著名、最有效、最成功的戰略規劃當屬諸葛亮的〈隆中對〉，劉備據此奠定根基，與曹操、孫權鼎足而三，也確定歷史「天下三分」的大勢，並且維持超過半世紀的時間。因此〈隆中對〉的歷史意義與價值，自不待言。

當是之時，劉備初至隆中見孔明，問其天下之策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諸葛孔明對曰：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¹

蜀漢前期的發展方針，大致遵循此一構想，整個三國早年的歷史走向，也依循其擘畫，最後歷史停留在「天下有變」，北伐成功之前；之後曹魏逐步坐大，雖然內部發生政爭，多數地方勢力叛亂，符合天下有變的條件，但蜀漢終未能復興漢室。論者多把責任歸諸關羽，以為關羽大意失荊州，自此蜀漢再不能有荊州，無法實現〈隆中對〉所策畫——兵分兩路，從荊、益兩州同時揮軍北上——的戰略構想，此後諸葛亮多次北征，多困於補給不暢，糧盡兵疲，無功而返。讀史者多責怪關羽不應急功冒進，以致大意失荊州，使〈隆中對〉的

¹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10月初版），頁912-913。

理想無法實現。

然而果真能將蜀漢北伐失敗的責任，全歸諸於關羽嗎？若荊州不失，蜀漢真能依靠〈隆中對〉兩路進兵的規劃統一天下嗎？失去荊州是關羽太過大意，還是兵力不足的必然成果？曹操南征、關羽、孫吳北伐，晉室一統，南朝北伐、北周攻打江陵，荊州都是重要戰場，如此兵家必爭之地，敵對勢力對此怎可能沒有企圖心呢？如果〈隆中對〉本就存在先天上的缺陷，諸葛亮在謀畫時就有窒礙難行之處，那麼蜀漢不能一統天下的責任，就未必全在關羽一人身上。

本文專論〈隆中對〉的缺失，並非〈隆中對〉一無是處，更不是好為貶抑古人，而是因為〈隆中對〉之優點已有許多學者討論過，不待多言；而〈隆中對〉無法貫徹之理，則多苛責關羽，因此筆者寄望能全面性的探討〈隆中對〉的缺失之處，或許能有新的視角看待三國歷史。

二、前人〈隆中對〉評論概述

昔人評議〈隆中對〉之得失，以王夫之《讀通鑑論》為代表：

諸葛公之始告先主也，曰：「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其后先主命關羽出襄、樊而自入蜀，先主沒，公自出祁山以圖關中，其略定于此矣。是其所為謀者，皆資形勢以為制勝之略也。蜀漢之保有宗社者數十年在此，而卒不能與曹氏爭中原者亦在此矣。以形勢言，出宛、雒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眾出秦川，而命將向宛、雒，失輕重矣。關羽之覆于呂蒙，固意外之變也；然使無呂蒙之中撓，羽即前而與操相當，羽其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敵操而固不足矣。宛、雒之師挫，則秦川之氣枵，而惡能應天下之變乎？乃公之言此也，以宛、雒為疑兵，使彼拒我于宛、雒，而乘間以取關中，此又用兵者偶然制勝之一策，聲東擊西，搖惑之以相牽制，乘倉猝相當之頃，一用之而得志耳。未可守此以為長策，規之于數年之前，而恃以行之于數年之後者也。敵一測之而事敗矣。謀天下之大，而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善取天下者，規模定乎天全，而奇正因乎時勢。故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馭之，無所不可。」操之所以自許為英雄，而公乃執一可以求必可，非操之敵矣。且形勢者，不可恃者也。荊州之兵利于水，一踰楚塞出宛、雒而氣餒于平陸；益州

之兵利于山，一踰劍閣出秦川而情搖于廣野。恃形勢，而形勢之外無恃焉，得則僅保其疆域，失則祇成乎坐困。以有恃而應無方，姜維之敗，所必然也。當先主飄零屢挫、托足無地之日，據益州以為資，可也；從此而書宛、雒、秦川之兩策，不可也。陳壽曰：「將略非其所長。」豈盡誣乎？²

王夫之此語，已略及〈隆中對〉兵分二路策略之困難處，然其核心要旨，仍在闡明「形勢不可恃」之概念，並非全面性檢討〈隆中對〉的得失。

近年來臺灣對〈隆中對〉的研究比較稀少片面，大抵都是推崇諸葛亮的謀劃，而把其失敗原因歸於關羽失荊州及劉備與孫吳正式開戰，使連吳抗曹、荊益兩路揮軍北上的計畫破滅³。而大陸方面對〈隆中對〉的檢討較為豐富多元，除了有人主張荊州並非必失⁴，關羽、劉備執行不力要負最大責任⁵，諸葛亮之策劃並無失誤⁶外，也有人認為諸葛亮墨守〈隆中對〉不知變通，例如在劉表新亡時不能把握機會早聯劉琦、孫吳拒曹操於江北⁷，失荊州後未能即時調整戰略⁸；有人認為諸葛亮不懂得利用漢中為南方屏障的優勢⁹；而最特出的論點，在於多數學者針對劉備究竟有無跨有荊、益的實力提出討論，這個論點直接指出了〈隆中對〉先天上的缺失，若劉備根本不可能跨有荊益，則〈隆中對〉必無成功的可能。

從地理形勢上來分析，荊州與益州的關係遠不如與揚州緊密，梁滿倉認為：

²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九·獻帝·二五》（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2月初版），頁291-292。

³ 如丁中江講述、丁燕石整理：〈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評「隆中對策」與「三分」〉和丁肇強：〈從戰略觀點論諸葛亮的「隆中對」〉兩文，均主張不當以關羽為荊州主帥。參見丁中江講述、丁燕石整理：〈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評「隆中對策」與「三分」〉，《印刻文學生活誌》24期，（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8月），頁176；丁肇強：〈從戰略觀點論諸葛亮的「隆中對」〉，《空軍學術月刊》393期（臺北：空軍學術月刊社，1989年8月），頁26。

⁴ 楊德炳：〈《隆中對》對「跨有荊益」得失再評說〉，《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1996年第2期（武漢：武漢大學，1996年2月），頁86-92。

⁵ 方詩銘：〈《隆中對》「跨有荊益」的策劃為何破滅——論劉備與關羽對喪失荊州的責任〉，《學術月刊》1997年第2期（上海：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1997年2月），頁53-60。

⁶ 魏平柱：〈《隆中對》對荊州情勢的分析〉，《襄樊學院學報》第28卷第7期（湖北：襄樊學院，2007年7月），頁77-79。

⁷ 黃曉陽：〈關羽北伐與《隆中對》再探〉，《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2期（成都：成都大學，2001年2月），頁74-76。

⁸ 徐日輝：〈試論《隆中對》戰略中的一著失棋〉，《浙江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杭州：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05年1月），頁155-159。

⁹ 段曉川：〈《隆中對》戰略缺陷之評析〉，《常熟理工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9期（常熟：常熟理工學院，2010年9月），頁87。

表面上看，長江像條玉帶，連起了益、荊、揚三顆明珠。但實際上，益州是處在中國地勢的第二階梯上，荊州、揚州則同處在第三條階梯上。益州四塞險固，山巒屏障，它的西面是邛崃山、大雪山，南面有大婁山、烏蒙山、北面橫亘著秦嶺、大巴山，東面矗立著巫山。四面的山就猶如高聳入雲的圍牆，把四川盆地環抱起來，在古代交通不便時隔斷了對外的聯繫。而荊州與揚州同處在長江中下游平原之上，兩地之間沒有天然屏障相隔，一條長江把兩州天然的連在一起。¹⁰

丁福虎也提到：「荊、益二州，一個是易攻難守，一個是易守難攻，中間是三峽天塹，難以連結在一起。……所以佔領荊、益二州之後，顧此失彼也就在所難免」¹¹，這是就先天的地勢上來說。

從國力上來看：

三國鼎立時，曹魏佔有北方十二個州，人口 443 萬，為漢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東吳佔有江東、東南沿海和湖南的大部分地區，總人口 250 萬，蜀漢佔有益州和荊州部分地區，人口 108 萬。魏、吳、蜀的人口比例大致為 4:2:1。西晉統一全國時（280 年），三個地區人口比例為 10:2:1。赤壁之戰時，曹操軍隊 16 萬，所得劉表軍隊 7 萬，作戰部隊總計為 22 至 25 萬；東吳作戰部隊僅有精兵 3 萬；劉備加上劉琦的軍隊，僅有 2 萬。直至蜀漢滅亡，蜀漢全國“帶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平均九個人務擔一個戰士，七家民戶養活一個吏”……由此看來，軍隊擴充到十萬之後，蜀國的綜合國力就難以支消了。¹²

養兵在民，無民則無以養兵。目前僅丁福虎明確精算三國人口數與兵丁數，而兩岸三國研究中都未見對於各地實際可耕田畝數的計載，甚是可惜。

由戰略地位來看，梅錚錚提到：「在劉備得到南郡之後，當年劉表的荊州地區，事實上已被曹、劉、孫三家瓜分。而三家之間地理位置成犬牙交錯之勢，彼此的矛盾也非常複

¹⁰ 梁滿倉：〈《隆中對》的成功與失誤〉，《襄樊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6 期（湖北：襄樊學院，2007 年 6 月），頁 60。

¹¹ 丁福虎：〈「隆中對」戰略定位得失談〉，《決策探索》1997 年第 11 期（鄭州：河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1997 年 11 月），頁 37。

¹² 丁福虎：〈「隆中對」戰略定位得失談〉，頁 37。

雜，稍有不慎，便可能爆發戰爭。」¹³梁滿倉提到：「從地理形勢上看，荊州在杭州上流，它關係到吳國的存亡，可以說沒有荊州便沒有吳國，所以孫吳勢所必爭。」¹⁴丁福虎也論荊州：「這是一個四戰之地，兩面受敵，不可能長久的存在下去。」¹⁵都認為即使劉備奪得荊州，荊州也將烽火不斷，無安寧日，稍一不慎，就可能丟失。

從劉備的實際行為來看，「諸葛亮以為，荊州與益州的地位是相當的，但劉備的主力卻放在了益州，而未放在荊州」¹⁶，「事實上，劉備自得益州後，將勢力發展的重心逐步西移。荊州雖為軍事要地，但因地理不便之故而實難兩全。如此說來，跨有荊、益的構想本身就存在深刻的矛盾。至少按劉備的實力，是二者不可得兼了。」¹⁷

大致而言，臺灣學者認為〈隆中對〉是非常好的計畫，蜀漢的敗亡正是沒有依照〈隆中對〉實施的結果；大陸學者的看法則存在較多歧異性，有些學者仍認為〈隆中對〉本身無誤，也有不少學者就〈隆中對〉先天的缺失加以分析，尤其在「跨有荊、益」的難度上，值得再做深入的思考。

三、〈隆中對〉五大難題

筆者探究〈隆中對〉之細節，並研討其中難題，以為諸葛孔明所擘畫之〈隆中對〉，先天本有無解之困境，故雖有三分之功，終無定鼎之業，非人謀不臧，執行者疏漏，蓋〈隆中對〉之北伐大計，僅屬理想狀態，假如沒有天命運氣偏袒，本就無法實現興復漢室，一統天下之偉業。今將〈隆中對〉之難題，析分以下五點論證之。

¹³ 梅錚錚：〈試論《隆中對》的構想與客觀實際的矛盾〉，《中華文化論壇》1999年第2期（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99年2月），頁50。

¹⁴ 梁滿倉：〈《隆中對》的政略修改與諸葛亮的北伐方針〉，《襄樊學院學報》第29卷第10期（湖北：襄樊學院，2008年10月），頁12。

¹⁵ 丁福虎：〈「隆中對」戰略定位得失談〉，頁37。

¹⁶ 付開鏡：〈《隆中對》實施中的祕密性和變異性〉，《襄樊學院學報》第31卷第7期（湖北：襄樊學院，2010年7月），頁11。

¹⁷ 梅錚錚：〈試論《隆中對》的構想與客觀實際的矛盾〉，頁51-52。

（一）與孫吳盟約不可靠

〈隆中對〉最重大的難題，在於與孫吳的盟約不可靠。赤壁之戰前，孫劉兩家的結盟本來就是外在壓力下的權宜之舉。《三國志·吳書·魯肅傳》記魯肅說服孫權聯合劉備以抗曹，其言曰：

夫荊楚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¹⁸

由這句「如有離違，宜別圖之」，可知在魯肅的計畫之中，結盟劉備只是一時的需要，日後時移勢遷，孫吳本就保留背盟的可能。

魏國程昱也是這樣看待孫劉兩家的盟約，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¹⁹，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曹操進兵江東，孫吳獨力難撐，孫劉兩家根本沒有聯盟的需要。雖然後來孫劉兩家透過聯姻、協議等外交手段，但這樣的盟約仍然十分脆弱，關鍵點在於孫權並不滿足於偏安一隅，而早有天下之志。《三國志·吳書·魯肅傳》記載孫權、魯肅初次見面的談話，魯肅說：

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之項羽，將軍由得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無自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帝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²⁰

由這句「建帝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可知魯肅為孫權所規劃的發展方針，其終極

¹⁸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頁 1269。

¹⁹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程昱傳》，頁 428。

²⁰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頁 1268。

目標不是偏安江東，而是建立一個大一統的新朝代。雖然孫權回應魯肅，謙稱：「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並不直接承認對方說中自己的心事，但由後文：「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²¹，從孫權對魯肅的禮遇，可知其心底深為讚賞魯肅的戰略規劃。〈魯肅傳〉又記載：

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眾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 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輶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²²

由此可見孫權、魯肅均不甘心偏安東南，而有志於天下。

劉備以興復漢室為號召，孫權則對天下有野心，因此兩人有根本矛盾存在。赤壁之戰前，孫權結盟劉備只是在曹操壓力下暫時的需要，因此隨著劉備勢力發展迅速，孫吳的假想敵由曹魏變成蜀漢時，這個盟約肯定不保。當劉備佔有漢中，關羽北伐，勢逼襄樊，進窺宛洛，其勢達於頂點時，孫吳此時的假想敵已由曹魏變成蜀漢，《三國志·吳書·呂蒙傳》清楚記載此一轉折：

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²³

²¹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頁 1269。

²²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頁 1270。

²³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呂蒙傳》，頁 1277-1278。

可見此時蜀漢勢強，已成孫吳之患。等到關羽北伐，呂蒙見機不可失，乃上疏言攻取荊州之法：「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²⁴可見孫吳背盟，一方面是因為蜀漢已成未來的假想敵，另一方面是因為此時襲取荊州，有大利可圖。

曹魏司馬懿亦看透吳蜀聯盟的根本，於關羽北伐時提出聯吳制蜀的主張。《晉書·高祖宣帝本紀》云：

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賊，欲徙河北。帝諫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疏，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獲。²⁵

這句「孫權、劉備，外親內疏，羽之得意，權所不願」，正是孫權背盟的關鍵。

孫權襲殺關羽以後，為求結盟曹魏，甚至屈身忍辱，稱臣受封，並勸曹操稱帝。《資治通鑑·卷六十八》記載：

魏王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²⁶

孫吳的外交方針看似前後矛盾，但其根本都是利益導向。赤壁之戰前，曹操勢將兼併江東，

²⁴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呂蒙傳》，頁1278。

²⁵ 唐·房玄齡等：《晉書·帝紀·高祖宣帝》（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10月初版），頁3。

²⁶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六十八》（臺北：天工書局，1988年），頁2172。《資治通鑑》之文乃統整自陳壽《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魏氏春秋》及《三國志·吳書·吳主傳》，雖《三國志》為其所本，但《三國志》文字散見各處，《資治通鑑》較為完整精約，故本文此處引《資治通鑑》為據，下同。參見晉·陳壽：《三國志》，頁52-53及頁1121。

雖然遣書孫吳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²⁷，然併吞孫吳之心，昭然若揭。此時魯肅對孫權剖析：「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²⁸，所以是時孫吳沒有屈身投降的可能；但孫吳佔有荊州，擒殺關羽以後，蜀漢勢必來攻，而此時曹魏準備不及，尚無大舉南侵，一統天下之勢，所以孫權此時付出稱臣的虛名，就可以避免兩面受敵的危機，實際並無損於江東的獨立。

孫權貫徹此一方針，爭取對國家最有利的條件，故夷陵之戰前，除了一方面遣使向劉備求和，另一方面遣使稱臣，接受曹丕封賜：

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並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逕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帝不聽，遂受吳降。……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²⁹

在魏吳結盟的條件中，曹丕索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鴨、長鳴雞」等財物，孫權悉與之³⁰；但以封其子登萬戶侯為藉口，入質於魏，孫權則

²⁷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頁1118。

²⁸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頁1270。

²⁹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六十九》，頁2193。《資治通鑑》之文源出陳壽：《三國志·魏書·文帝紀》、《三國志·魏書·劉曄傳》及裴松之注引《傅子》、與《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然《三國志》史料散見各處，不易檢索，而《資治通鑑》較為完整精鍊，故本文此處引《資治通鑑》為據。參見晉·陳壽：《三國志》，頁78、頁446-447、及頁1121-1122。

³⁰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頁1124。

辭之³¹，這些手段莫不說明孫曹兩家的結盟，孫吳僅僅付出虛名與財貨，並未失去其獨立性，可知此一盟約，不過一時緩兵之計，避免兩面開戰的困境，並不具有實質的效力。

因此當夷陵戰後，蜀漢的威脅已經解除，孫吳先主動聯絡彼此，《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記載：「十二月，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於白帝，始復通也。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³²」，其間約一年，孫吳同時與曹魏、蜀漢來往，可見其外交一切以利益為依歸，全無信義可言。《資治通鑑·卷七十》記載：

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並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³³

從黃初四年（西元 223 年）鄧芝使吳後，吳蜀的關係才算穩定下來，但此盟約雙方之所以均能信守，蓋此時蜀漢已經沒有背棄盟約的實力，而孫吳荊州已得，也沒有背棄盟約的需要，反而曹魏成為彼此最大的威脅，所以盟約才穩定下來。

由是以觀，孫吳的外交政策充滿彈性，所為所事無道義可言，一切的準則只有國家利益，聯姻、稱臣都只是手段，無法保證盟約的有效；反過來蜀漢的建立以反對曹操、恢復漢室為號召，因此並不存在聯魏制吳的空間，外交策略與威脅、反制孫吳背盟的手段，均

³¹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吳主傳》，頁 1123。《資治通鑑》則較《三國志》多「為萬戶侯」四字，參見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六十九》，頁 2198。

³²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吳主傳》，頁 1126。

³³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七十》，頁 2217。《資治通鑑》之史料源自陳壽：《三國志·蜀書·鄧芝傳》，然〈鄧芝傳〉並無鄧芝出使之時間，而《資治通鑑》編年為體，便於計算孫吳同時結好曹魏、蜀漢之時間，故本文此處引《資治通鑑》為據。參見晉·陳壽：《三國志·蜀書·鄧芝傳》，頁 1071-1072。

遠較孫吳貧乏。

由於〈隆中對〉所規劃之方針，結盟孫吳是重中之重，以便使劉備無後顧之憂，專心兩路並進，以伐關中、宛洛，然而諸葛亮並沒有更可靠的方法，保證孫劉兩家的盟約，加以孫權的外交方略隨機應變，甚至可以屈身忍辱，稱臣受封，又乏信義，同時與蜀漢、曹魏兩家往來，更以天下為志，而非止於割據偏安，因此在若有厚利可圖，孫吳遲早背盟，這是〈隆中對〉所無法解決的難題之一。

（二）荊州乃四戰之地

〈隆中對〉第二個難題，乃諸葛亮為劉備所選之根據荊州，為一關鍵要地，曹魏、孫吳、蜀漢，乃至於後來的司馬晉，均以荊州為主要戰爭動線。曹操赤壁之戰前的南下路線，就沿著漢水而進。前文所引《三國志·吳書·魯肅傳》記載孫權、魯肅初次對答時，魯肅為孫權所規劃之發展方針，即主張：「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帝號以圖天下」³⁴，故可知孫權對荊州的企圖心。

《三國志·吳書·甘寧傳》亦有類似之語：

今漢祚日微，曹操彌驕，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³⁵

甘寧與魯肅對孫吳的發展方針，都是先取荊州，「漸規巴蜀」，「竟長江所極」，兩人所見略同。

至於司馬氏對荊州的看重，可由陸抗最後一次上疏窺知。《三國志·吳書·陸抗傳》記載：

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

³⁴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1268。

³⁵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甘寧傳》，頁1292-1293。

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³⁶

由前文論述可知，曹魏、孫吳、司馬晉等，均極看重荊州，為各方必爭之地。因為荊州是兵家必爭之地，所以陸抗指出其缺點：「雖云易守，亦復易失」，頻繁的戰爭只能：「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因此長期佔有荊州，將面臨：「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的困境。三國後期東吳陸抗所面臨經營荊州的問題，在三國前期早已存在，無論是劉表、劉備據有荊州，都得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戰爭，差別只是陸抗主要經營北、西兩面防線，而劉表、劉備主要經營北、東兩面防線，然其多線防禦、戰爭頻繁的本質並無二致。換句話說，即使關羽加強荊州防務，不輕易北伐，只要曹魏、孫吳均以荊州為目標，且如前述吳蜀之間的盟約不可靠，那麼為了保住荊州，關羽遲早會面臨四面八方的戰事，而在頻繁的征戰中，把蜀漢的戰爭潛力消耗一空。今以關羽敗亡的建安二十四年（西元 219 年）為界，計算東吳佔領荊州後的重大戰爭，西元 222 年夷陵之戰與劉備火拼，夷陵戰後曹魏三路進逼，亦由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222 年底孫盛奪中洲，223 年初又給張郃奪回，之後在此拉鋸，226 年孫吳與曹魏戰於江夏、襄陽，241 年戰於樊城，250 戰於夷陵、江陵、秭歸等地，252 年戰於南郡、武昌，261 年吳將鄧油、李光詐降，264 年蜀漢滅亡後，陸抗西爭蜀漢故地，司馬昭使胡烈攻西陵，逼陸抗退兵，268 年又戰於江夏、襄陽，272 年吳步闡降晉，引發羊祜與陸抗爭西陵的戰役，277 年吳將孫慎又劫掠江夏，278 年杜預初代羊祜，立即偷襲西陵督張政，279 年晉大舉伐吳，六路大軍就有三路攻武昌、夏口、江陵，佔總大軍之半，中軍屯於襄陽，可見荊州為其中樞紐，280 年二月晉師克西陵，三月孫吳就滅亡，可見荊州的

³⁶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陸抗傳》，頁 1359-1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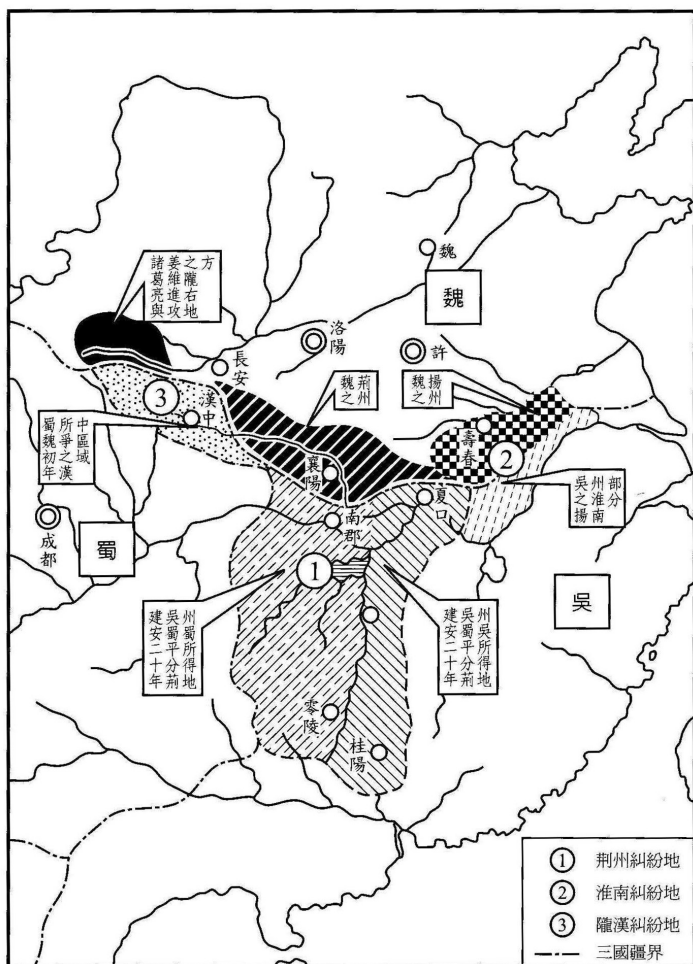
戰事，與孫吳國運相終始。這還僅計算《資治通鑑》所錄發生在荊州的大戰，實際發生在荊州的武裝衝突更多，而且自夷陵戰後，蜀漢無力東侵，孫吳和曹魏間在荊州的戰役，就如此頻繁，難怪陸抗極言：「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三國後期孫吳為保有荊州，付出極大的代價，因此就算關羽不失荊州，蜀漢要保有荊州，仍得消耗大量的戰爭資源，這是荊州此一兵家必爭之地不可避免的難題。

再從三國時期糾紛地帶以觀荊州形勢，陳致平《三國史話》有一〈三國糾紛地帶形勢圖〉，其中最大的戰爭區塊，就是荊州之地：³⁷

這樣的戰略要地，為兵家所必爭，再再證明無論哪一勢力擁有荊州之地，都得隨時面臨戰爭的壓力與破壞。

不管鎮守荊州為何人，保有荊州這四戰之地，絕對得付出莫大的代價。丁中江〈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評「隆中對策」與「三分」〉一文云：

劉備和孫權聯盟因為關羽守荊州而成為聯盟毀壞的導火線。關羽是名將，忠義自許，但劉備千不該、萬不該派他去守荊州。荊州統帥的條件是要懂外交、懂運用，



三國糾紛地帶形勢圖

³⁷ 引自陳致平：《三國史話》（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1月二版一刷），頁95。

能利用孫權集團和曹操集團的矛盾，該讓的時候讓，該爭的時候爭，要能以柔性與彈性戰略和戰術，互為運用。不幸關羽予智自雄，剛愎自用，柔性和彈性方面非其所長，且正是其所短，因其短而導致麥城之敗。因關羽毀敗而瓦解蜀、吳聯盟。諸葛亮雖籌畫出三分之舉，卻無法掌握三分的變化，致使蜀漢終不能興復漢室。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時也！命也！³⁸

又如丁肇強〈從戰略觀點論諸葛亮的「隆中對」〉一文結語主張：

總之，諸葛亮的「隆中對」，是我國歷史上最具體、完整，而且非常卓越的統一天下的全程戰略構想。遺憾的是在執行的過程中，不幸發生了嚴重而難以補救的過失和錯誤，使其五項之得所獲得的利，抵銷不了四項之失所產生的害，其中尤以荊州之失，為「隆中對」的致命傷。且沒有荊州之失，就不會有猇亭之敗，這兩次失敗，使蜀軍的戰力顯著降低，在以後的7年之內均無法獲得補充；尤其是能征慣戰的將才傷亡較多，後繼乏人；而荊州的喪失，更使蜀漢的戰略態勢陷於不利。

假如當時能以驍勇善戰、熟諳韜略、忠貞守志、均衡穩健並深明大義的趙雲，取代關羽鎮守荊州，也許「隆中對」可能會有成功的希望！³⁹

丁肇強主張以趙雲代關羽，則荊州自安，但在吳蜀脆弱的盟約保障下，就算以外交手段暫緩荊州的兵災，長期在吳蜀終極目標的衝突下，仍然不能保證荊州不會同時面臨兩線作戰。實際上劉備的主要根據地為荊、益二州，三國時代的州牧就有獨立為一勢力的可能，更何況荊州相當於蜀漢的一半勢力，劉備既然自領益州牧，那麼領荊州的，一定是該集團的第二號人物。所以劉備入蜀，以諸葛亮鎮荊州，關羽佐之，等到龐統陣亡，劉備調諸葛亮至身邊參謀，荊州自然得由集團的第三號人物關羽鎮守。孫吳自有荊州以後，荊州由江東士族的代表陸遜鎮守，陸遜、陸抗父子在孫吳政權中的重要性，均可證明荊州鎮守在集團的地位特出。

推究諸葛亮選荊州之理，一來是荊州是劉備僅有的機會，另外是北伐的要道。諸葛亮選荊州為基地，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那時曹操已破袁紹，勢力之盛，一時無兩，當時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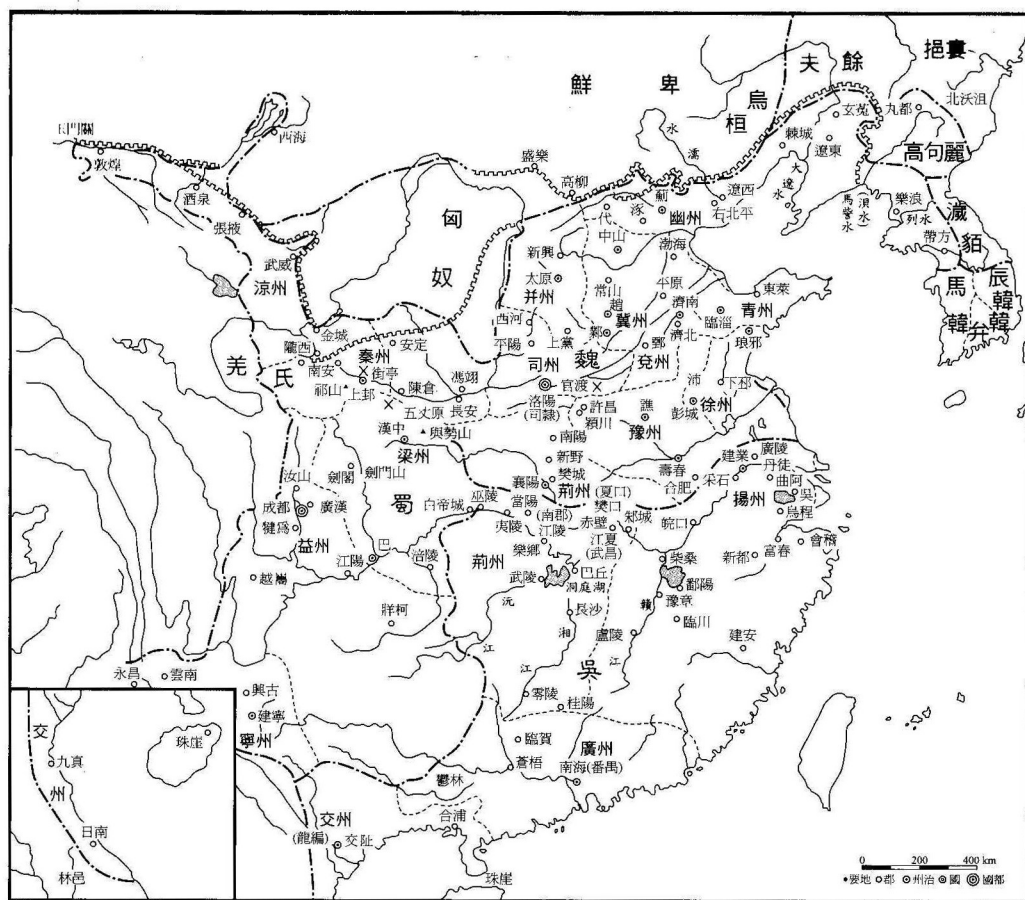
³⁸ 丁中江講述、丁燕石整理：〈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評「隆中對策」與「三分」〉，頁186。

³⁹ 丁肇強：〈從戰略觀點論諸葛亮的「隆中對」〉，頁26。

根據地都沒有的劉備，在中原根本不可能立足；而江東之地，歷經孫堅、孫策、孫權的經營，基礎已然穩固，加之孫權年少力壯，謀臣武將歸心，也沒有機會。放眼整個中國，只有年邁將死的劉表，待其亡故之後，二子爭嗣，或有可乘之機，所以諸葛亮選荊州，有其不得不然的背景。至於劉備攻取益州之後，荊州仍有大用，因為古代戰爭最方便的補給路線，是沿江河進行，所以南北主要的戰爭發生在漢水、淮河流域，所以蜀漢必須保有荊州這塊容易補給、進兵的交通要道。但是保有荊州的代價太大，連年戰事不斷，除非蜀漢能在荊州取得類似赤壁之戰、夷陵之戰的重大勝利，以寡擊眾，使曹魏、孫吳再也無力窺伺荊州，方才有可能長久保有此一四戰之地。但寄望於此，顯然不切實際。更何況西元 208 年曹操於赤壁大敗，222 年趁吳蜀夷陵大戰，又兵伐荊州，因此要長時保有荊州，每次戰爭都需以大勝作收，而不能陷入無止境的消耗戰。然而綜觀整個三國時代發生在荊州的戰事，絕大多數荊州都是彼此拉鋸的絞肉場。以蜀漢的國力，夷陵之戰劉備損失四萬之眾就一蹶不振，如何能撐起荊州無底洞的消耗？荊州戰事會將蜀漢拖入無止境的消耗，是〈隆中對〉所無法解決的難題之二。

（三）蜀漢資源分為二路大軍後更為薄弱

蜀漢的人口、賦稅主要集中荊州、益州數城之間，廣大的鄉野之地，仍然不是政令可以到達的地方。觀諸陳致平《三國史話·三國時代圖》，更可見蜀漢領地的都市，屈指可數：



三國時代圖

40

由是可見蜀漢人口、經濟實力的低弱。從前述丁福虎〈「隆中對」戰略定位得失談〉統計三國時代「魏、吳、蜀的人口比例大致為 4:2:1」，到西晉統一全國時「三個地區人口比例為 10:2:1」⁴¹，也可以清楚看出蜀漢人口的貧乏。三國時代經濟以農業為主，人口多寡代表經濟實力，也是兵員補充的基礎，顯然蜀漢是三國時代人口資源最匱乏的政權。

但在諸葛亮〈隆中對〉兵分兩路的設計之下，各種戰爭資源都得一分為二：一軍拆為兩部，且路線相去又遠，兩者難以相互援應，難免讓敵人有各個擊破的機會。現存史料並未明書關羽北伐的軍隊總數，但是劉備為關羽報仇，並打算奪回荊州，其所謂大軍僅四萬

⁴⁰ 引自陳致平：《三國史話》，頁 2。

⁴¹ 丁福虎：〈「隆中對」戰略定位得失談〉，頁 37。

人⁴²，相比周瑜對曹操赤壁大軍的估計有十五六萬人，劉表降眾七八萬人⁴³，或是陸遜率領前來抵抗劉備軍隊的五萬軍⁴⁴，劉備的部隊真的不算什麼，更何況這還是劉備準備近兩年的大軍⁴⁵。冷兵器時代科技差距並不大，兵力、指揮、將卒主導戰爭的勝負，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劉備伐吳大軍只有四萬眾，關羽北伐軍力可想而知。難怪關羽盡起荊州兵以圍襄樊，因為部隊有限，多留軍隊守備江陵、公安，則進攻軍隊不足，久而難下，消耗也更大。從蜀漢兩次與孫吳大戰的兵力來看，蜀漢的部隊、戰爭資源無法撐起兩面作戰的規模，兵分兩路徒留給敵人各個擊破的機會。

裴松之《三國志注》更有：「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⁴⁶之語，不知其言是否可靠，若然為真，則蜀漢舉國兵力不過五萬，若兵分兩路，各得二、三萬。已知蜀漢北伐，曹魏只要堅壁清野，據城而守，尋釁消耗雙方兵力，待機各個擊破，則蜀漢的戰爭資源難有尺寸之功，更容易無端浪費。也就是因為雙方經濟能力相去太遠，曹魏兵員、戰將、米糧、金錢、物資消耗得起，待蜀漢兵力損耗疲軟，大舉反攻，一戰而定，這是蜀漢先天的劣勢，若更兵分兩路，每一路大軍的力量更行薄弱，調度之餘，必將捉襟見肘，關羽就是把後方留守的兵力，也調集到前線，期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攻城拔營，以致於後方空虛，乃為呂蒙所趁。

蜀漢資源本就不夠豐富，兵分兩路之後，每一路的兵力更行薄弱，於攻守之際，不免

⁴²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以是知夷陵之戰劉備兵四萬。晉·陳壽：《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頁79。

⁴³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吳主傳》，頁1262。

⁴⁴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黃武元年，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以是知夷陵之戰陸遜兵五萬。晉·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頁1346。

⁴⁵ 關羽於西元219年底敗亡，劉備伐吳事在221年七月，故此推測劉備為奪回荊州，準備近兩年之久。

⁴⁶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頁834。

有所破綻，是〈隆中對〉所無法解決的難題之三。

（四）信息傳遞無法即時

〈隆中對〉所設計的東西兩路北伐大軍一沿漢水流域北進，一沿棧道翻越劍閣、秦嶺，二者之間山嶺阻絕，在指揮調度與情報分享上，兩路大軍易流於各自為戰的狀況。實際上關羽兵敗麥城，其時劉備、諸葛亮在成都，不及救之，就是兵分兩路的缺陷。

三國時代的情報蒐集、分析、傳遞等均十分落伍，對於戰機的判斷尤為困難。《三國志》幾次稱讚謀臣臨事斷機之善，都是在沒有情報下對敵情做出正確的預判。如〈賈詡傳〉：

詡說繡與劉表連和，太祖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⁴⁷

又如建安二十二年法正勸劉備出兵漢中，云：

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徧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

⁴⁷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賈詡傳》，頁329。

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⁴⁸

這些都是在有限的訊息下對敵情做出精確的預判，以是掌握戰機，克敵致勝。而〈隆中對〉所設計的北伐方案乃兵分兩路，一沿漢水流域北進，一沿棧道翻越劍閣、秦嶺，二者之間道路阻絕，信息不通，就必須有兩大軍師，依靠有限的訊息，判斷戰情，掌握戰機。況且兩路軍各自為戰，各自佔領土地、丁口，徵集補給，而兩邊的戰爭資源難以流通，若是一方恰有變故，另一路勢必難以迅速反應，予以救援，使得蜀漢本已寡弱的戰爭資源備多力分，難以作最適切調度。

觀建安二十四年（西元 219 年）蜀漢的東西兩路戰事，西路軍於建安二十二年（西元 217 年）冬天進屯漢中，二十三年四月起與魏將夏侯淵、張郃、徐晃等征戰於陽平關，雙方各有勝負，至二十四年五月曹操引兵還，漢中戰事方才告一段落。冷兵器時代，重視士卒氣力，醫療又不發達，再善戰的將卒於連年征戰後，身體多少都會有傷害，因此一場戰役經過一二年之久後，就得進入休整期，否則戰力、士氣均難以為繼，再訓練有素的軍隊也會厭戰，所謂師老兵疲是也。因此劉備此時兵還成都休整，沒有直接調遣軍隊到荊州戰場上，僅派遣少數未曾久戰的部隊配合關羽，這是很自然的事。《三國志·蜀書·劉封傳》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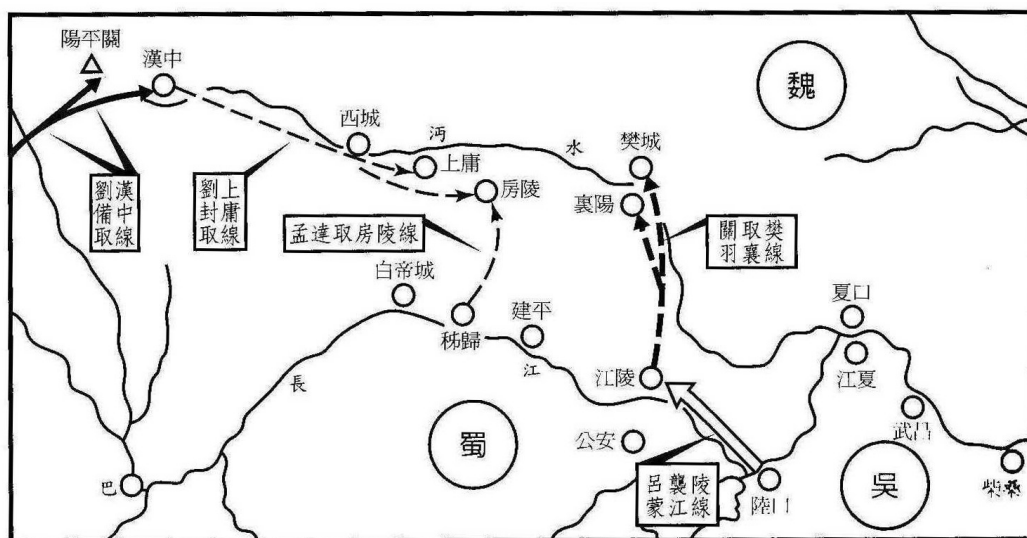
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為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為新城郡，以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⁴⁹

⁴⁸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法正傳》，頁 961。

⁴⁹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劉封傳》，頁 991-992。

可證此時配合關羽作戰的部隊，一是宜都太守孟達，觀其進兵路線，是從秭歸出發，北攻房陵，由此可見其部隊未經漢中之戰，當為新銳之師；一是養子劉封，由漢中出發，順漢水南下，兩者會合後以劉封統孟達之兵，再攻下上庸。就劉備整個作戰意圖言，顯然欲配合關羽從漢水上下游兩路夾攻襄樊。然而關羽苦等不到由上庸、房陵而來的援軍，屢次催促均不果，只好抽調荊州防備孫吳的兵力上前線。陳致平《三國史話》言道：

原來關羽的失敗，主要原因，固然由於呂蒙的偷襲江陵，還有一個原因，是劉封、孟達的失援。關羽之所以決心進攻襄、樊，是因為劉封、孟達攻克上庸、西城、房陵三城，控制了漢水的上游。關羽從南郡北伐，計畫與劉、孟同時進兵，以鉗形攻勢，拿下襄、樊。及至樊城鏖戰，不料劉、孟之師竟遲遲不到。關羽一再催促，劉、孟推稱：「山城初下，人心為附，不能擅離！」而始終未發一兵一卒，以致貽誤軍機，戰局改觀。⁵⁰



219 年漢中與荊襄之戰形勢圖

51

⁵⁰ 陳致平：《三國史話》，頁 110。

⁵¹ 引自陳致平：《三國史話》，頁 106。

可見上庸、西城、房陵不能即時出兵，需為關羽的敗亡負重大責任。關羽敗亡於西元 219 年 12 月，220 年 7 月孟達歸魏，相差半年多，就蜀漢戰後究責言，顯然延遲甚久，推其理由，亦交通不便，甚至讓曹魏復奪上庸、西城、房陵三城，未能即時做出妥善的應對，這些都證明漢水流域和四川盆地間的交通阻隔，讓蜀漢軍事調動、情報分享等，出現太久的延遲。因此蜀漢東西兩路大軍各自為戰，無法相互援應，是〈隆中對〉無法解決的難題之四。

（五）北方經濟成長遠較南方快速

〈隆中對〉提到北伐的時機，是「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然而「天下有變」的時效很緊，並非可以長時間等待機會。

孫吳、蜀漢與曹操分庭抗禮的經濟基礎在於北方連年戰爭，比起相對穩定的南方，其社會經濟破壞更嚴重，使得曹魏歷經赤壁之敗後，短時間內無法組織大軍征伐吳、蜀，留給二者發展的機會。陳致平《中國通史》言道：

到了漢末董卓之大亂，兩京丘墟，白骨盈野，社會經濟幾乎全面崩潰。在漢末的割據群雄，軍中都無以為食。曹操靠許下屯田，才能勉強的支撐起他的政權。後經魏武、魏文之極力經營，國家經濟才漸漸復甦，東都洛陽也從廢墟中建設起來。究竟人力物力還是非常缺乏，所以當魏明帝要營建宮室時，陳群與高堂隆都上書力諫，說天下喪亂之後，民少財窮，無力為此。在漢末地方上損失較少，經濟較裕的是江南與蜀中，所以孫權、劉備才能據以成三分之局。但三國間的戰爭頻繁，人口的死亡與流離仍多，故至吸進統一時，粗略的統計，戶口竟不及東漢順桓時的三分之一了。⁵²

這裡指出「在漢末地方上損失較少，經濟較裕的是江南與蜀中，所以孫權、劉備才能據以成三分之局」，但是北方土地、人口究竟較南方為多，雖然因為戰亂，人民流離，大量的土地沒有人耕作，但隨著北方戰事逐漸告一段落，人口逐步增加，生產逐漸恢復，荒廢的田地也重新耕作；而江南與蜀中則需開發新的田地，招來逃難的民眾，或是由生育補充人

⁵² 陳致平：《中國通史·第二篇》（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 年 7 月三版），頁 560-561。

口，這些對經濟力成長的幫助非常有限。亦即北方的經濟成長，靠恢復就好；南方則需要開發，兩者經濟成長的速率自然不同。從前述丁福虎〈「隆中對」戰略定位得失談〉統計三國時代「魏、吳、蜀的人口比例大致為 4:2:1」，到西晉統一全國時「三個地區人口比例為 10:2:1」⁵³，更可以清楚看出三國各政權人口發展速率的差距。

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第二冊·第五章》舉史料為據，證明曹操的屯田政策，水利建設等，使得生產力漸次提高⁵⁴。薩孟武說：「傅玄之言雖有誇張之處，然國民經濟的復興是不容置疑的，由是人民流亡出境者就漸次歸還本土。比方關中，建安初年，地甚荒涼，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戶，及聞本土安寧，均歸還關中，而使關中充實起來」⁵⁵，又說：「然正始以後，朝中雖有政變，而國外尚無大規模的戰爭，人民得息仔肩，於是三國勢力的均衡就破壞了。中國文化是由北方漸向南方發展。隋唐以前，北方文化比南方高，北方戶口也比南方多。戶口是古代兵力與財力的源泉，北方戶口多於南方，就是北方的兵力與財力大於南方。」⁵⁶這些論述無不表明雖然北方因為戰亂，社會經濟一時遭受破壞，但隨著北方殘餘勢力逐漸被曹魏掃平，三國鼎立的架構穩定下來，北方的經濟力快速恢復，三國勢力自然出現嚴重落差。更何況此時的戰爭，主要出現在三國交界處，其中曹、劉的交界處多崇山峻嶺，在此開戰對社會經濟破壞不大，而發生在曹魏與孫吳之間的戰爭，集中江、淮流域，尤其荊州地區破壞尤甚。前引陳致平《三國史話·三國糾紛地帶形勢圖》，足資為證。

《晉書·食貨志》言及三國時代的人口流動，云：

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入果還，關中豐實。⁵⁷

大量的人口流動，使曹魏的經濟積累，遠超過蜀漢、孫吳。因此蜀漢、孫吳北伐的時機，

⁵³ 丁福虎：〈「隆中對」戰略定位得失談〉，頁 37。

⁵⁴ 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第二冊·第五章》（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3 年 9 月三版），頁 75-80。

⁵⁵ 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第二冊》，頁 80。

⁵⁶ 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第二冊》，頁 80。

⁵⁷ 唐·房玄齡等：《晉書·帝紀·高祖宣帝》，頁 784。

只在曹操赤壁新敗，整個曹魏集團的戰爭積累消耗一空，曹操對關鍵要地的爭奪較為有心無力，此時最為容易蠶食北方的土地，人口。在資本主義興起之前，舊帝國主義以爭奪人口、土地為主，蜀漢、孫吳均趁此一時機，或出漢中，或沿漢水，或走淮水，與曹魏爭奪土地、人口。之後隨著北方的戰亂趨於緩和，黃河中下游的平原長年沒有戰爭，此皆漢代糧倉，為曹魏、司馬晉等政權的侵略提供足夠的後勤保障，這是蜀漢、孫吳所不具備的條件。

再以城池看人口之分布，中國古代帝王的統治，以都市為核心，因此廣闊的鄉野，均無法獲得賦稅、人力的徵集。今觀三國都市圖，可知曹魏佔有絕大多數已開發區，相比蜀漢、孫吳開發鄉野，曹魏復甦殘破之經濟顯然更為快速。

中國南方的開發，一直到五代十國，南方的經濟力才逐漸超過北方，因此在宋代以前，南北對立，最終統一天下的必為北方政權，關鍵在於南北對立的時機，多半因北方戰亂殘破，而南邊相對穩定，使南方政權有分庭抗禮的資源；一旦北方政權統治趨於穩定，北邊經濟力的復甦將倍於南方，故分裂的政權最終由北邊勝出，如晉室一統、隋代一統、宋朝一統，原因均在此。

因此〈隆中對〉所規劃北伐時機，雖說得配合「天下有變」，但如果「天下有變」的時間太晚，比如曹魏與司馬晉易代之際，忠於曹魏集團的地方勢力接連起義，此時中央朝廷的戰爭積累充足，幾次弭平叛亂，征討外族，以及同蜀漢、孫吳間的戰爭損耗，均能迅速獲得補充；反觀陸抗上疏陳言：「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⁵⁸，顯然荊州的戰爭損耗，均未能及時補充，雙方經濟力相去太遠，無須蓋世名將，單單用消耗戰術也要耗垮蜀漢與孫吳，這是〈隆中對〉所無法解決的難題之五。

四、結語

總括來說，諸葛亮〈隆中對〉固然屬非常成功的戰略分析很精妙，引導整個三國前期的歷史走向，但因有上述五大無解之難題，故雖有三分之功，卻無定鼎之業。

取天下者，除了人謀，尚須天運。上述五大難題，除非天運偏袒，讓蜀漢多次在荊州取得以寡擊眾的重大勝利，曹魏與孫吳陷入戰爭泥淖無法自拔，將曹魏與孫吳的戰爭潛力

⁵⁸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陸抗傳》，頁 1359。

消耗一空，加以北伐兩路進擊時諸軍默契十足，配合得宜，又沒有意料之外的突發變故，讓兩路大軍專心地攻城掠地，趁著曹魏赤壁之戰後，原先的戰爭儲備消耗殆盡，北方尚有馬超、張魯等後顧之憂的時機下，或有成功的可能。一旦進入三國鼎立時代，三方相對穩定，專心發展內政，累積戰爭資源，北方國力的積累速度，必將遠過蜀漢、孫吳，因此由北邊政權統一天下是必然的道理。

雖然〈隆中對〉存在上述無解之難題，但亦不可抹煞其價值。假若唯物決定歷史，經濟決定成敗，人的作為無法改變這一切，那麼與曹、孫鼎立的應該是劉璋才對，可最後是劉備據地自雄，鼎足而三，這是諸葛亮〈隆中對〉為其尋得立足之地與發展方針，加上劉備本身的條件，乃成一方之雄。

筆者意以為諸葛亮擘畫伊始，就僅能確立三分天下的藍圖，至於興復漢室，需要更多條件的配合，只能看天意是否相成，並沒有必然的把握。但沒有〈隆中對〉，決無三方鼎足之勢，這是可以確定的，故可謂從建安十三年（208）確立天下三分至景元四年（263）年蜀漢滅亡為止，其間五十五年三國鼎立格局，是諸葛亮所導演的。魯肅見孫權，雖然也有極為類似的規劃，但孫權之立，得力於父兄基業，一開始的起點就遠比沒有根據地的劉備要高的多，再加上魯肅「竟長江所極」的戰略版圖也沒有實現，相對於諸葛亮曾經使蜀漢：「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初步實現〈隆中對〉的規劃，無疑就戰略面言，諸葛亮的〈隆中對〉更難能可貴。

知其得，則知其失；知其失，則益知其得。本文評議〈隆中對〉之缺失，非為貶抑古人，蓋客觀討論〈隆中對〉之侷限，避免有所偏頗，將漢室無法復興之責，全歸諸關羽之失荊州，而未能檢討〈隆中對〉本有之難題：蜀漢兵力、戰爭儲備有限，古代訊息不暢，凡此二者，均增加兵分兩路之難度；再者孫吳遲早背盟以取荊州，荊州乃狂吞戰略資源之黑洞，而華北實較江東、蜀中開發完善，北方戰事稍歇，經濟生產即可快速恢復，一旦戰事持久，淪為國力之消耗，先崩潰者，必蜀漢、孫吳也。明白此理，或能貼近古人之智慧與侷限，知曉其擘畫歷史脈絡、規模國家發展方針之難度，則必更欽敬其人其智矣！

徵引文獻

古籍

- * 晉·陳壽：《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10月初版）。
- * 唐·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10月初版）。
-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天工書局，1988年）。
- *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2月初版）。

近人論著

- 丁中江講述、丁燕石整理：〈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評「隆中對策」與「三分」〉，
《印刻文學生活誌》24期（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8月），頁174-186。
- * 丁福虎：〈「隆中對」戰略定位得失談〉，《決策探索》1997年第11期（鄭州：河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1997年11月），頁36-87。
- 丁肇強：〈從戰略觀點論諸葛亮的「隆中對」〉，《空軍學術月刊》393期（臺北：空軍學術月刊社，1989年8月），頁19-26。
- 方詩銘：〈《隆中對》「跨有荊益」的策劃為何破滅——論劉備與關羽對喪失荊州的責任〉，《學術月刊》1997年第2期（上海：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1997年2月），頁53-60。
- 付開鏡：〈《隆中對》實施中的祕密性和變異性〉，《襄樊學院學報》第31卷第7期（湖北：襄樊學院，2010年7月），頁9-14。
- 段曉川：〈《隆中對》戰略缺陷之評析〉，《常熟理工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9期（常熟：常熟理工學院，2010年9月），頁87-107。
- 徐日輝：〈試論《隆中對》戰略中的一著失棋〉，《浙江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杭州：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05年1月），頁155-159。
- * 陳致平：《中國通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7月三版）
- * 陳致平：《三國史話》（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1月二版一刷）
- * 梁滿倉：〈《隆中對》的成功與失誤〉，《襄樊學院學報》第28卷第6期（湖北：襄樊學院，2007年6月），頁56-62。
- 梁滿倉：〈《隆中對》的政略修改與諸葛亮的北伐方針〉，《襄樊學院學報》第29卷第10期（湖北：襄樊學院，2008年10月），頁12-19。
- * 梅錚錚：〈試論《隆中對》的構想與客觀實際的矛盾〉，《中華文化論壇》1999年第2期（成都：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99 年 2 月），頁 49-53。

黃曉陽：〈關羽北伐與《隆中對》再探〉，《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 年第 2 期（成都：成都大學，2001 年 2 月），頁 74-76。

楊德炳：〈《隆中對》對「跨有荊益」得失再評說〉，《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1996 年第 2 期（武漢：武漢大學，1996 年 2 月），頁 86-92。

* 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3 年 9 月三版）

魏平柱：〈《隆中對》對荊州情勢的分析〉，《襄樊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7 期（湖北：襄樊學院，2007 年 7 月），頁 77-79。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Shou. "*San Guo Zh i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Taipei:Ting Wen Publishing House, 1976.
- Chen, Zhi-ping. "*San Guo Shi Hua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Taipei:San Min Book Co., Ltd, 2008.
- Chen, Zhi-ping. "*Zhong Guo Tong Shi(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Taipei:Li M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Ltd, 1981.
- Ding, Fu-hu. "*Long Zhong Dui Zhan Lue Ding Wei De Shi Ta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trategic Role of“Longzhong Plan”)*,” Jue Ce Tan Suo (Policy Research & Exploration), Iss.11, 1997, pp.36-87.
- Fang, Xuan-ling. et al, "*Jin Shu (History of the Jin dynasty)*". Taipei:Ting Wen Publishing House, 1976.
- Liang, Man-cang. "*Long Zhong Dui De Cheng Gong Yu Shi Wu (Success and Failure of “Longzhong Plan”)*,” Xiang Fan Xiao Yuan Xiao Bao (Journal of Xiangfan University), Vol.28, Iss.6, 2007, pp.56-62.
- Mei, Zheng-zheng. "*Shi Lun Long Zhong Dui De Gou Xiang Yu Ke Guan Shi Ji De Mao Dun (Research on Contradic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Longzhong Plan” and the Objective Reality)*,” Zhong Hua Wen Hua Lun Tan (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Iss.2, 1999, pp.49-53.
- Sa, Meng-wu. "*Zhong Guo She Hui Zheng Zhi Shi (Chinese History of Social Politics)*". Taipei:San Min Book Co., Ltd, 1983.
- Si, Ma-guang. "*Zi Zhi Tong Jian (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Taipei: Tian Gong Publishing House, 1988.

A Criticism on the Negligence in *Long-Zhong Strategic Plan*

Pan, Po-nien ; Lin, Hsiao-yun

(Received March 28, 2012; Accepted June 28, 2012)

Abstract

The credit and negligence of *Long-Zhong Strategic Plan* has always been the topic of thesis across the Strait. Taiwanese scholars are inclined to attribute Shu Han's failure of reviving Han Dynasty to Guan Yu's negligence in losing Jingzhou; yet this theory may be quite subjective and has ignored other possibility. 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have gradually directed the negligence to *Long-Zhong Strategic Plan*, but their arguments varied from positions which end up failing to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is point. Thus, the thesis will aim at discussing and analyzing the negligence of *Long-Zhong Strategic Plan*.

The thesis suggests that *Long-Zhong Strategic Plan* has five major unsolved questions which it did have credits for determining the Three Kingdoms but failed to strengthen the reign. The success sheds light on its loss, and vice versa. By criticizing the negligence of *Long-Zhong Strategic Plan*, one can realize the history that Zhuge Liang helped Liu Bei who yet owned any bases at the time plan a precise and feasible kingdom blueprint with his outstanding vision and intelligence, and further played an influential role for nearly half of a century. However on account of environmental predicament, reviving Han Dynasty has been an impossible mission in the very beginning which one cannot judge whether whom is a hero by one failure or success.

Keywords: Long-Zhong Strategic Plan, Zhuge Liang, Three Kingdoms period, Shu Han

